

《阎明复回忆录》出版——

详细披露中苏关系破裂原因

本报记者 吉祥

历时10年，阎明复终于完成了95万字的回忆录，书出版时，他已是84岁高龄。

阎明复是中共谍报英雄阎宝航之子，一生经历丰富，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统战部部长等职务。1997年至今，历任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会长、荣誉会长。

在《阎明复回忆录》中，阎明复写了自己的少年时代、大学岁月、翻译生涯、“文革”遭遇和改革开放后的许多往事，时间跨度超过半个世纪，涉及众多历史人物，但着墨最多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苏关系。从1952年阎明复以翻译身份陪同刘少奇参加苏共十九大见到斯大林，到1989年阎明复陪同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作者参与和见证了中苏关系中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完整和真实地再现了历史，而且首次披露了中苏两国领导人会谈的原始记录。

“在回忆录里，他作为重要目击者、当事人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他所回忆的历史细节、场景和氛围具有长远的历史价值。”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章百家说。

中苏关系为何破裂？

在阎明复这本近百万字的回忆录中，关于中苏关系的内容超过了一半篇幅。其中许多史料尚属首次公开。

阎明复在回忆录中说：“作为中办翻译，我曾在伟人们身边工作了十年，亲历了中苏关系从蜜月到冷战的过程，想把那些历史事件真实记录下来。在回想和思索中，我感到这里涉及的不仅是导致中苏关系变化的国际大背景，还有国内复杂的政治环境，阶级斗争的人为激化，‘文化大革命’的爆发，等等。”

在《阎明复回忆录》出版座谈会上，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说，阎明复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领导同志在许多重大场合担任翻译，比如陪同刘少奇出席中共十九大，陪同李富春访苏商定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赫鲁晓夫秘密访华，1963年中苏两党九次会谈等等，可以说见证了中苏两党由蜜月期到出现裂痕到恶化再到断交的全过程。作为历史亲历者，阎明复在书中对斯大林、米高扬等苏联领导人都有独特的观察。章百家也指出，尽管有很多当事人都回忆过中苏关系，但像阎明复这样全面完整的回忆“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为了写作这本书，阎明复查阅了大量档案资料。阎明复的女儿阎兰说，父亲无数次到国家档案馆查阅资料，有些俄文名字记得不是很清楚，需要反复核实，“有时候突然半夜醒来想起

一件事，想起一个名字，赶快在身边的小纸条上记下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苏东所原所长李静杰指出，中苏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国家关系，中国受苏联影响很深。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苏关系曾经历了一段蜜月期。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胡德平在座谈会上谈到了书中写的一个细节：当时的苏联专家，只要拿着工作证，一个小红本，在中国出入哪里都没人限制。当时鞍钢来了几位苏联专家，问中共中央在哪儿，问中南海在哪儿，问毛主席在哪儿，中方工作人员都为其提供了方便，最后真的见到了毛主席。

在李静杰看来，《阎明复回忆录》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就在于，首次比较科学和全面地回答了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中苏两国从结盟最后走向分裂，这是冷战时期国际关系中的最大事件，不过对于其原因，却是一个“世纪性课题”。

上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下决心改善中苏关系。他委托原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组织研究中苏关系的历史，特别是研究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以便为苏共中央制定新的对华政策提供参考和依据。阿尔希波夫组织众多苏联学者和当事人进行讨论和研究，最后形成一个《总结》报告。阿尔希波夫上世纪50年代是苏联援华专家组总负责人，与中国老一代领

导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与阎明复私交也很好。1995年夏，阎明复访俄期间，阿尔希波夫出于对中俄关系未来发展的期待，将《总结》报告的内容告诉了他。《总结》报告的基本观点是：中苏关系破裂的主要责任在苏联，是赫鲁晓夫把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对中国施加压力造成的。

江泽民得知《总结》报告的内容后，提出了一个问题要求大家研究：“中苏分裂，中国方面有什么责任？”此后，阎明复牵头组织了两场大型研讨会，探讨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和中苏大论战。李静杰说，研讨会最后形成两个《纪要》，总的结论是：在国家关系方面，苏联的责任更大；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的责任更大。“《阎明复回忆录》把中苏两个方面的总结都收了进来，让过去只有少数人才能看到的材料公之于众。”李静杰说，这有助于引发更多的人思考这些重大问题。

胡德平特别赞赏阎明复对中苏大论战的观点。“中苏大论战脱离了已经变化的历史实际，成为一场‘空对空’的论战。”在胡德平看来，阎明复的这一分析吻合了邓小平的观点。

李静杰回忆，在两场研讨会结束后，阎明复又提了一个建议：把俄罗斯方面中苏关系的当事人和学者请来，双方坐在一起，共同总结教训。不过，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成行。

多呈现，少议论
一就是一，二就是二

章百家对阎明复的写作手法很是推崇，“多呈现，少议论。能做到这一点，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撰写者对自己的位置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他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历史的见证人。”李静杰记得，阎明复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只是一个小翻译。”

读《阎明复回忆录》让章百家想起曾参加胡乔木回忆录编写组工作的经历。章百家说，胡乔木曾专门提出要求：一定要把事实写准确，把事

情的来龙去脉交待清楚，结论要慎下，如何评价是后人的事情。“读阎老的回忆录也有这样的感觉，当事人所做的只是把准确的素材提供给后人。这本书记述平实，都是亲历的东西。叙述尽管充满情感，但也看得出，作者在记述重大事件时尽量减少个人倾向。”章百家说，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是一种忠实于历史的态度。

阎兰说，父亲在叙述历史时讲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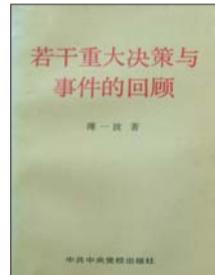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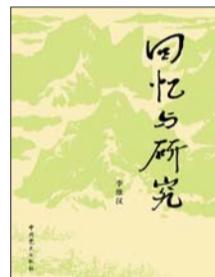
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从来不添油加醋，不拐弯抹角。书中谈到，1952年阎明复随刘少奇出席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在闭幕当天，斯大林发表简短讲话，“他步履蹒跚，确实已到了衰老的晚年。”尽管对斯大林在苏联的威望印象深刻，但阎明复直言，自己并没有进入大会的会场，“我在会场外面，当时我的身份是翻译，还没有资格进去参加会议。”关于会议的情况，都是他从侧门看到的。



1956年11月17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和民族院两主席举行的宴会上，彭真团长致辞，阎明复进行现场翻译。



【相关阅读】

《阎明复回忆录》
阎明复 著
人民出版社《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薄一波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杨尚昆回忆录》
杨尚昆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回忆与研究》
李维汉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阅读领导人回忆录：
让历史不再局限于教科书

这些年，退休领导人著书立说渐成惯例。《阎明复回忆录》便是近期非常受关注的一部著作。

在《阎明复回忆录》出版座谈会上，章百家说，领导人写回忆录，本是各国各个时代都会有的，但中国的情况多少有点特殊。很长一段时间，许多重要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党的高级干部都不写回忆录。章百家分析，这一方面是因为老同志组织纪律性都非常强，长期的革命斗争使他们养成了事事都要保密的习惯，许多人都没有想过，应该把自己的经历和经验写下来，传之后人；另一方面是党内文化的影响，老同志都非常谦虚，总觉得一切应归功于党的领导，自己只是做了些具体工作，没有什么可说的。陈云同志便有一句名言：“假如你在党的领导下做一点工作，做得还不错，对这个功劳怎样看？我说这里有三个因素：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就连《陈云文选》，陈云也不同意出版。在邓小平建议下，他最终才同意。

在章百家看来，另一个曾经阻碍领导人撰写回忆录的原因是档案长期不开放，有的老同志虽有写回忆录的想法，但苦于无法核对当年的档案，又担心自己的记忆不准确，只得作罢。“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之后，有了变化。”章百家说，上世纪90年代初，已经退休的党内元老薄一波出版个人回忆录——《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为领导人撰写回忆录开了个头。

随着社会越来越开放，退休领导人著书立说的越来越多。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大鹏曾撰文指出，退休领导人出书不再作为中央政策的解读和依据，更多的是作为重大事件的决策者和亲历者的一种信息披露，当然也包括自己的感悟与思考。王大鹏说，从最近这些年的观察看，党和国家领导人出的书主要包括三类，第一是重大政策的回顾，例如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第二类是领导者个人的决策历程，比如李鹏同志先后出版的多本日记。第三类则是与领导人的专业与个人兴趣爱好有关，比如李瑞环先后出版的《学哲学用哲学》、《辩证法随谈》和《务实求理》，李岚清的《李岚清音乐笔谈》，吴官正的《闲来笔谈》，都与他们曾经担任的领导职务直接关系不大，更多的是体现一种个人兴趣和爱好。

“随着思想更加解放，社会更加开放，才有越来越多的老同志开始撰写回忆录，而回忆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章百家说，多种多样的领导人回忆录，可以使后人看到丰富的历史画面，而不是教科书上干巴巴的几条总结。这对于后人了解我们国家、民族的历程，是非曲折、经验教训，前辈的经历、心路历程是不可或缺的。